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三卷)

主 编 卿希泰 副主编 詹石窗

人 民 大 版 社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SELECTED WORKS OF THE CHINA
NATIONAL FUND FOR SOCIAL SCIENCES

中国道教思想史

(第三卷)



人 民 出 版 社

组稿编辑:方国根

责任编辑:李之美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道教思想史(第三卷)/卿希泰主编 詹石窗副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ISBN 978-7-01-008211-0

I. 中… II. 卿… III. 道教史:思想史-中国 IV. B95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027 号

中国道教思想史

ZHONGGUO DAOJIAO SIXIANG SHI

(第三卷)

主编 卿希泰 副主编 詹石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5.75

字数:562 千字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978-7-01-008211-0 定价:8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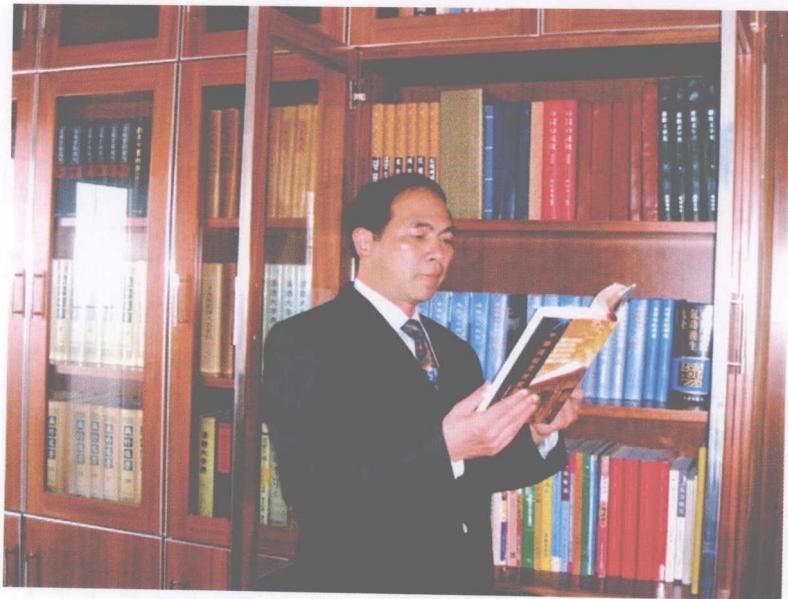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主编简介

卿希泰 男，1928年生，四川省三台县人。先后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副教授，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规划评审组副组长、首届全国高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宗教学研究》《儒道释博士论丛》和《宗教与社会丛书》主编。先后编著出版《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宗教概论》、《道教文化新探》、《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等各类学术著作700余万字，并荣获国家级和部省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3次，其中一等奖6次、二等奖5次。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副主编简介

詹石窗 男，1954年生，福建省厦门市人。1982年获厦门大学哲学学士，1986年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哲学硕士，1996年获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百年道教研究与创新工程”等10多个课题。主要著作有《道教文学史》、《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20余部，组织编纂《国学新知文库》等多系列大型学术丛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个人著作先后获得省部级奖10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

《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优秀成果代表国家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集中展示这些优秀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文库》将按照“高质量的成果、高水平的编辑、高标准的印刷”和“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的总体要求陆续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5年6月

《中国道教思想史》

写 作 组

主 编 卿希泰

副 主 编 詹石窗

第三卷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燕琴	刘 剑	江 峰	朱亚辉	吴大振
张 欣	张 钦	张泽洪	张培高	张晓粉
陈进国	陈 霞	周 冶	苟 波	钦伟刚
唐大潮	卿希泰	郭 武	夏 涛	黄小石
黄永锋	盖建民	蒋朝君	詹石窗	

凡例

一、本书凡引先秦诸子百家古籍，其出处仅注书名与篇名，如《论语·述而》、《尚书·洪范》。凡引两汉以来文集，若其书名中已经出现作者名者则其前不再加注作者名。

二、本书使用的《道藏》系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版本，个别引文根据《四库全书》参校。《藏外道书》系巴蜀书社1994年影印本。《四库全书》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本。佛教《大正新修大藏经》系台湾“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影印版，引用时简称为《大正藏》。此数部大丛书在第一次引用时详细注明版本信息，从第二次引用开始则只注明丛书名以及册数、页码。

三、凡引述古本影印书，先列作者、书名、卷数，再列丛书册数及页码；若其古本书名已经在行文中出现，则仅注其丛书册数、页码。

四、本书所引《二十五史》，均略其作者名，仅注书名、卷数及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册数、页码。其余古籍，凡作者可考者则注明之。

五、本书凡引当今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在引用时一律注明作者、书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与册数或卷数、页码；凡出版社名称包含地名者不再另外注地名。

六、地方志依学术界惯例，直接在其前冠以刊刻年代，如“嘉庆《惠安县志》”等。家谱、族谱，凡地域可考者，乃冠其前，如“庐峰《蔡氏族谱》”，其刊刻年代刊刻者则列之于后，如“顺昌《谢氏宗谱·霞标公轮流收办祭簿记》，道光三十年撰”。

七、本书之行文，凡涉及年号等传统干支纪年，在其后加上公元年作为说明，如“太和丁未”（227年）；若属于公元前者，则在其前加上“前”字，如汉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年）。至于人物生卒年，一般也在其人名之后加括号说明之，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即是其出生或者去世之年。

目 录

第四编 南宋金元至明中叶的道教思想

引 言	(3)
第二十一章 南宋元代神霄、太一等道派的思想	(9)
第一节 神霄派的宇宙观与保神养心的内丹思想	(9)
第二节 清微派心性说与丹功法术相结合的内炼思想	(16)
第三节 东华派的心性学与科仪法箓修行思想	(22)
第四节 天心派的心性学及其修炼、救度思想	(28)
第二十二章 南宋元代金丹派南宗的思想	(34)
第一节 石泰、薛道光、陈楠的炼命修性说	(35)
第二节 白玉蟾对金丹派南宗的思想总结和发展	(47)
第三节 翁葆光的“男女双修”与“三乘秘要”说	(65)
第四节 龙眉子、李简易对金丹派南宗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73)
第二十三章 南宋元代净明道的思想	(81)
第一节 “净明”概念的由来及其意蕴	(81)
第二节 净明道的救世度人思想与儒道融通的伦理观	(94)
第三节 净明道以忠孝为旨要的身心健康思想	(117)

第四节 净明道的修炼理论与符箓法术思想	(125)
第二十四章 金元太一道与真大道的思想	(139)
第一节 太一道的产生及其符法济世思想和平民品格	(140)
第二节 大道教的兴起及其思想特点	(161)
第二十五章 金元时代全真道的产生及其思想	(177)
第一节 王重阳创教与全真理论的初步形成	(177)
第二节 丘处机对全真道的理论贡献	(197)
第三节 尹志平与全真道的思想完善	(212)
第二十六章 南北宗合流下的“参同学”与修道理论	(232)
第一节 陈显微的仙圣观与修炼方法论	(233)
第二节 陈显微与俞琰对“参同学”的发展	(259)
第三节 李道纯的三教统合论与内丹心性学	(279)
第四节 陈致虚的丹道思想及其在南北宗合流中的作用	(296)
第二十七章 南宋至明中叶的道教科技思想	(321)
第一节 曾慥对道教养生思想的总结与阐扬	(321)
第二节 李鹏飞的“三元延寿”医学养生理论	(329)
第三节 陈旉《农书》中的农学思想	(350)
第四节 赵友钦《革象新书》中的天文物理思想	(359)
第二十八章 南宋至明代中叶的斋醮科仪及其济度思想	(367)
第一节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的济度思想	(367)
第二节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的祈禳、济度思想	(390)
第三节 周思得《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的思想	(398)
第二十九章 元末至明中叶道派的思想交错	(411)
第一节 赵宜真《原阳子法语》的“自性法身”说	(411)
第二节 张宇初对道教义理的解说、整合与管理问题的新思考	(416)

第三节 王道渊以“混然”为理路的道教思想	(426)
第三十章 元末至明中叶内丹心性理论的整合变通	(437)
第一节 张三丰及其“经天纬地”的修道思想	(437)
第二节 何道全“随机应化”的道学思想	(451)
第三节 阳道生的“真诠”思想	(462)
第三十一章 南宋至明中叶道教与儒、释的思想关系	(482)
第一节 道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	(483)
第二节 理学家对道教的态度及思想汲取	(494)
第三节 佛教“三教合一”思想的发展	(515)
第三十二章 南宋至明中叶的劝善书与文学中的道教思想	(525)
第一节 道教劝善书的流行及其主要思想	(525)
第二节 道教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544)

第四编

南宋金元至明中叶的 道教思想

引言

在中国历史上，1127年不仅是朝代更替的一个时间分界线，而且是考察思想文化流迁的一个界标。这一年既意味着北宋王朝统治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的朝政对峙的开始。北方女真族的强悍，使得南宋朝廷在武力上相形见绌。在一百多年中，由于政治分立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使南北人民经受了深重的苦难。

从总体上看，南宋朝廷在武力上是无法与北方金国相抗衡的，故而只能在屈服之下寻求偏安。面对社会危机，朝野上下都在寻求立足与生存的空间。一方面，南宋朝廷采取了许多措施，以维持偏安局面，其中包括思想上在崇尚儒学的前提下，通过“三教并用”来稳定社会局势。另一方面，民间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也空前高涨。在这种状态下，道教获得了新的机会。于是，许多在北宋时期孕育的道派在南宋时期便兴盛起来，例如神霄派、清微派、东华派、天心派，都发端于北宋甚至更早的时候，但却在南宋以来获得长足的发展。此外，南宋社会还出现了几个新道派，例如金丹派南宗、净明道，都是南宋特殊背景催生下的产物，带有明显的南宋社会的思想气象。

与南宋相对峙的北方金国，以崇尚武力而著称，对于思想文化建设来说相对较为忽略；然而，社会的精神需求往往不是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社会压迫、民族矛盾加重的时候，民众寻求精神寄托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北方产生了太一道、大道教、全真道这样的新道派。这三大道派之所以被学者们冠之以“新”的称号，是因为它们不仅在组织上的确与此前的天师道、上清派、灵宝派、楼观派有别，而且在思想上也具有新的内涵和个性气质。新道派所具有的新思想，透过一系列的经

典文献表现出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无论从道教修行的立场看，还是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北方的太一道、大道教、全真道的一些个性化的思想修养主张都是值得仔细考察和认真总结的。

经过激烈角逐之后，蒙古贵族相继灭金、灭宋，从而建立了元朝大帝国。由于特殊的机缘，蒙古统治者从成吉思汗开始就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只要是存在于其统治区域内，蒙古统治者都一样予以容纳，这给各宗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人们不会忘记，成吉思汗尚在远征乃蛮的途中，即遣使召见当时的全真道领袖丘处机，从此元朝统治者便与全真道建立了密切关系。除了全真道之外，其他道派也一样得到蒙古统治者的认可。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当金国区域并入元朝版图之后，发端于北方的大道教、太一道立刻获得元室的承认和扶植。至于南方的“三山符篆派”以及其他一些小道派，随着新的一统国家的形成，不仅具有了存在的合法性，而且重新获得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道教思想文化建设也逐步繁荣起来，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玄都宝藏》的编纂，这项浩大工程虽然是由全真道士主持进行的，但能够积聚力量予以完成，这本身就反映了道教组织的壮大和学术力量的雄厚。

当朱元璋率兵打败了元朝统治者的时候，明朝新政权代替了元朝帝国。作为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民情的一位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儒、释、道三教在治国中的各自妙用，尽管他最为看重的是肇始于孔夫子的儒家学说，但对于道教、佛教却也相当重视，在他看来，道教、佛教可以“暗助王纲”^①，因此是不可缺的。实际上，朱元璋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已经与一些神仙异人密切交往，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例如素有“疯道人”之称的周癫仙、以戴铁冠闻名的张中等等，都与明太祖相当亲近。他即皇帝位之后，对于张陵第四十二代孙张正常、第四十三代孙张宇初以及其他许多正一派道士都相当器重；至于全真道的著名道士，如张三丰一类人物也颇得明太祖之仰慕与礼敬。不仅如此，明太祖还认真学习与钻研道教教理教义，亲自注疏《道德经》，作为治国修身的蓝本。明太祖的举动对后代皇帝无疑具有直接的影响。朱元璋之后，明朝皇帝大多都效法其开国皇帝，给予道教比较

^① 明太祖：《三教论》，《明太祖文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3册，第108页。

大的发展机会，从明成祖到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等各朝皇帝，虽然仰慕道教的具体表现不同，但在实施一定管理措施的前提下又都给予政策上的扶植，这却是一致的。可以说，明代从初叶到中叶，国家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故而其文化建设也是颇有成就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道藏》的编纂。早在明成祖即位之初，他便诏令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道藏》编修工作。永乐年间，又多次催办。张宇初奉命主持编修，他率领道教中的一班能文之士，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工程浩大，《道藏》的编修直到英宗正统九年（1445年）方才完成，故而这部道教大丛书名之曰《正统道藏》。明代《道藏》的编纂既是元代以来道教思想文化成果的总结，也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直到今天，我们考察与研究道教，主要还是依据明代遗留下来的《正统道藏》，可见它在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任何一种思想主张的形成和发展都与时代的政治背景、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道教思想也是如此。故而，只要我们回归历史，那就会发现，从南宋到明代初中叶，道教思想具有了许多新的特色。

首先，道教经典的造作、诠释与宋明理学相互交错。道教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必须依靠一定的载体，经典的造作、诠释可以说是道教思想的最主要的载体。所以，道教自创建以来就相当重视这个问题。然而，不同时期，道教的经典造作与诠释是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的。考察南宋以来直到明代中叶的道教经典造作及其诠释类著述，我们不难看出，此一时期道教中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述理学家们的言论，运用其相关概念来论述心性修养等问题，无论是紫阳派还是全真道的核心人物，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表现出这方面的素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文化现象，是因为宋明理学的创立本来就被道教思想所辐射。先有周敦颐借助道教的《无极图》构建了以太极派生阴阳、五行并进一步衍化万事万物的宇宙论体系；继有邵雍以道教河洛数理、八卦、六十四卦的符号链条为架构，创立了先天象数学体系。此后，张载提出“气本论”，把无形而有实的气看做世界的本原，并进一步演绎出包括“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等概念在内的心性学与认知论；与此同时，程颢、程颐兄弟则建立了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理本论”体系，他们通过“性即理”这一命题把本原论、认知论、